

我們農業生產合作社 的政治思想工作

饒興禮

湖北人民出版社

我們農業生產合作社
的政治思想工作

鍾興禮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漢口解放大道32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武漢市國營湖北印刷廠印刷

*

書號：305·787×1092紙張開·書印張·11，000字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50,000

編輯者的說明

湖北省浠水縣饒興禮農業生產合作社，現在已經由初級社過渡到高級社了，並且命名為“十月”農業生產合作社。這本小冊子，是饒興禮同志記敘他們合作社進行政治工作的經驗，原名“不斷地加強對社員的政治思想工作”，曾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日“湖北日報”上發表過。出版前，我們根據中共浠水縣委宣傳部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在“湖北日報”上發表的“饒興禮農業社黨組織的政治思想工作”等文作了若干補充。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目 錄

按照國家計劃進行生產.....	2
樹立集體主義思想.....	3
提倡勤儉辦社.....	6
克服保守思想，推廣先進經驗.....	8
進行勞動增產的教育.....	10
提高政治警惕，打擊敵人破壞.....	11
在整社中結合整黨、整團.....	12
進行政治思想工作的方法.....	13

我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在一九五二年春天建立的。在這四年當中，由於逐年發揮了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生產上一年比一年強，社員收入一年比一年增加。拿建社前一九五一年的生產和一九五五年的生產比較起來，各方面都起了很大的變化：水稻原先每畝產五百五十多斤，現在提高到六百三十多斤；旱地小麥原先每畝產一百五十多斤（籽麥），現在提高到三百八十多斤（南大二四一九）；棉花原先每畝產籽花五十多斤（中棉），現在提高到二百六十多斤（岱字棉）。再拿播種面積來說，由於多種一季和利用荒地，一九五五年比一九五一年分散經營時擴大了百分之三十還多。說起社員的收入來，一九五五年比起一九五一年，平均要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到一九五五年為止，我們社裏共有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共有財產，包括現金和基本建設，達到九千元以上。很多社員說：“我們社裏一年變一個樣子，走社會主義的道路，越走越有勁”。這四年來，黨領導我們合作社做了我們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在黨的教育下，我們全體社員的社會主義覺悟逐步提高了，懂得了黨所指引的合作化的道路，是我們農民徹底翻身的道路。最近，學習了毛主席的指示後，在十一月七日這個偉大的節日裏，我們和鄰近的五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轉為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社了。這是我們土地改革以後的又一件大喜事。

但是，這件大喜事並不是一帆風順到來的，當中的確出現了不少問題，也碰到了不少的困難，所以能夠順利發展，是和黨

進行了許許多多政治思想工作分不開的。“十月”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成立，充分地證明了黨的路綫的正確和思想工作的重大勝利。當然，我們還只能說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是剛剛開步走，更艱鉅的政治工作還在今後。現在我只談談我們合作社幾年以來進行政治工作的幾點主要情況和體會。

按照國家計劃進行生產

社員入社的要求，是希望逐年增加收入；但有一部分人認為要增加收入，就要看生產什麼划得來，想搞些投機取巧的事情。比如一九五四年秋天，稻穀收割以後，一連五十多天不下雨，社裏蓄的秧孫（再生稻）長不起來，眼看擴大晚秋作物面積的再增產計劃就要落空。黨支部研究了這個情況，認為只有突擊改種旱作物，才能保證計劃的完成。但是，要改種旱作物，必須把磚瓦隊的勞動力暫時抽出來分配到各生產隊去突擊生產，等搶到了季節以後再轉回去。這一個辦法提出來，却沒有很快地為全體社員同意。原因是有一些社員認為：只要增加收入，搞什麼划得來就搞什麼；他們覺得搞副業賺錢快，又穩當，所以不同意支部的計劃。社員郭少秋說：“改種是好，要是碰上了災，丟種籽事小，還要白費工。”生產組長陳揚生打了個如意算盤，他說：“改種的收成靠不靠得住是兩個字。要是靠不住，影響了明年春收，還去了多的。政府不是號召增加生產增加收入嗎？我們多搭一萬塊磚，就值四百元，只花一百塊錢的柴火錢就夠了，賺的三百塊還可以買六千斤穀。六千斤穀，要想從農業上增產，累斷脊樑骨也不行。”他的這段話越發打動了那些只圖賺錢的社員，影響很多社員都不願意改種。黨支部看到這種情況，感覺必須提高社員的覺悟，引導大家認識到全省大

片地區受到水災，非災區的農民大力增產糧食，才是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和支援災區的頭等任務，那種只顧自己多掙收入，不顧國家和人民的需要，是非常錯誤的。這樣啓發了大家，改種旱作物的計劃就貫徹下去了。又如制訂一九五五年生產計劃時，開始因為沒有深入挖掘農業增產的潛力，有些社員認為要使一九五五年收入增加，最重要的還是要把蠶業搞好。三隊社員郭少安說：“農業上找一片天，折不到副業上燒一個竈。”並提議從農業上再抽入加強蠶業。黨支部發覺這仍然是一種錯誤的經營思想沒有徹底解決，與農業生產合作社必須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經營方針是不符的，於是，一面對社員進行按照國家計劃進行生產的教育，一面把附近星光農業生產合作社一九五四年偏重蠶業的事實在社員中進行對比討論。星光農業生產合作社一九五四年偏重蠶業，冬播不打土巴，我們社和他們社共的塘泥，他們不挑（他們一九五五年已經糾正了）。社員認識到他們是忘了根本，只有按照國家計劃生產才有前途。社員陳友全說：“像星光農業生產合作社那樣搞下去，糧食生產就要減少；工人老太哥造抽水機、噴霧器給我們用，我們應該多生產糧食支援工業化。”後來找出了農業潛力，縮小了蠶業，蠶業上的勞動力、耕牛，在農忙時抽回農業隊參加農業生產。這一年，蠶業磚瓦賣不出去，壟田改種每畝收了兩百多斤小麥。支部抓住這兩件事及時向社員進行對比教育，使社員認識到按照國家計劃進行生產，對國家好，對自己也有利。

樹立集體主義思想

黨支部經常向社員進行愛社教育，使社員樹立“以社為家”的思想。有一次正割小麥，天快要下雨，生產隊長周行德馬上

放下正在收割的小塊自留地的麥子，急忙去和大家搶收社裏的麥子。別人問他：“你那麥子收了？”他說：“不要緊，我那一點打濕了烘也烘得乾。社裏財產重要。”他這種愛社思想使大家受到啓發，一股勁把社裏的小麥收上了場。但是也有只顧自己不顧合作社利益的人。如有一次薅秧苗的二道腳，社員陳細坤看見一棵稗草，本來應該扯掉，可是爲了趕工分，又怕泥漿糊了手，却故意潑起泥巴糊住稗草，“捏着鼻子哄眼睛”。黨支部爲了用事實教育社員，讓社員圍繞這兩件事，討論社員應該用什麼態度對待社裏生產，以及社員收入從哪裏來等問題，使社員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這一次的討論，不僅使社員陳細坤認識到自己做得不對，別的社員也受到教育。有的檢討說：“我原來想，全社那多人，我一個人做得再好，臨到我名下才分得幾大一點，所以對公共財產不關心。”有的說：“社的財產就是我們大家的財產，積少成多，人人愛護，大家才有利。”

我們社裏基本建設資金原來都是靠國家貸款，一九五四年秋季分配時，社裏準備積累一些公積金，有些社員却不同意。中農社員李助和、鄧良勝說：“這一扣那一挖，將來分到名下就不會有什麼東西了。”幹部向他們解釋：“留公積金是爲了社裏的基本建設和擴大生產。”他們却說：“我們耕牛、農具都入了社，現在又要留公積金置東西，還是百事沒有的人（貧農）沾光。”部分黨員也怕留公積金影響社員收入，表現也不積極。黨支部認爲，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首先從黨內作起。在支部大會上，由會計郭卿祿（黨員）把幾年來因爲公共積累不多使經營上發生很多困難的情況，作了詳細的介紹，黨員才統一了思想，認識到了社裏沒有公積金，是空架子，生產也搞不好。接着從有利生產方面去啓發社員，並依靠貧農社員，對中農社員算互利賬。這樣一來，過去反對留公積金的社員，現在也都沒有意見

了。

社裏在實行“包工包產”制以後，加強了個人和集體的責任制。但是，由於政治工作沒有跟上，先後出現了一些投機取巧的事情。比如：第一隊社員張少權的母親撿棉花，是用過秤的方法計算她的勞動工分。她想多混工分，悄悄地放了一塊半斤重的石頭在棉花中，被社員占海波發現了，及時報告了隊長。第四隊中農社員李助和，有一晚上叫他老婆起來偷社裏的草，被社裏保衛員周國安看到了。這固然是突出現象，但是不注意工作質量的情況，却是很不少的。我們就用這兩個典型在社內展開了討論。通過討論，社員認識到混工分、偷社裏財產，是“剝肉補瘡，損公利己”，結果會破壞社的鞏固，一致要求要這種人改正錯誤，並在全體社員中以愛社如家的周國安、占海波為榜樣，要求向他們學習。大家認為：只有這樣，合作社才能越辦越鞏固。同時結合評功表模，對社員進行了一次活的愛社教育。

黨支部經常教育社員克服本位主義思想，凡事要從全社打算，這是搞好生產很重要的一點。一九五四年夏天，五隊的棉花生長不好，想把最壞的棉花追一次肥，但是糞水不多。四隊糞水明明有多，可是藉口自己要用，不肯和五隊調劑。五隊隊長同四隊商量：“明天輪着你們上街打糞，讓一天行不行？”四隊隊長說：“工都排好了，怎麼好改變呢！”黨支部認為這是本位主義思想在作怪，一方面動員三隊讓些糞水給五隊，一方面向四隊隊長陶紹先進行全社是一家的教育。開始他想不通，說：“隊裏不同意，叫我怎麼辦呢！”支部告訴他，一個隊的生產搞不好，是全社的損失。還打比方說：“一九五四年湖北遭了水災，要是別省和你們隊的想法一樣，不積極賣餘糧支援災區，那還成什麼世界！”這樣教育了陶紹先，四、五隊的關係也搞好了。

在隊與隊之間出現的本位主義，特別是在包工包產問題上表現得突出。一九五四年包工包產的結果，是二、三兩個生產隊得獎，四、五兩個生產隊賠產，賠產隊強調客觀原因，得獎隊之間也有“爭風吃醋”的情緒，後來黨支部開會掌握處理“包工包產”原則，統一黨、團員思想，層層做工作，並且在社員中討論：為什麼要“包產”、得獎是什麼原因、對社有什麼好處；賠了產是什麼原因、如何爭取下季得獎，等等，引導社員從集體利益出發來總結生產。第五隊檢查稻穀賠產的原因，是沒有執行社委會關於稀下秧、寬辦秧田的決議，插得遲，並且是檢別隊不要的秧來插，所以減了產。還認識到：得獎隊對國家對社有貢獻，賠產隊對國家對社有損失。四隊隊長陶紹先說：“社裏是希望大家都得獎，今年賠了，下年再爭取（得獎）。”一九五五年，這個隊的面貌大為轉變，棉花被評為全社第一。

提倡勤儉辦社

從我們辦四年初級社的經驗可以看出：生產越發展，社員的收入增加，越要加強對社員進行政治思想工作。社員收入逐年增加，帶來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就是社員開始放棄艱苦奮鬥的精神，盲目地改善生活。一九五四年，我們社在財務上發生了大量超支的現象，有個別社員明明只需要用一元，却向社裏支三元在家裏放着，一時支不到錢，還要發牢騷。分配時有二十二戶共超支了二千三百多元。社員的大量超支，造成社的公積金有名無實。如一九五五年春天要修水利，做糞窖，沒有錢買材料，直接影響到社裏的再增產。發生這個問題以後，黨支部及時開會討論，認為這是一個新問題，必須自上而下的開展增產節約的教育。教育的方法，是進行討論兩個典型：一個是

社員南金望，平時用錢少，勞動好，分配時除所進的實物外，還進了現金一百九十多元，當時存一百元在社裏作生產投資；一個是社員張成法，本人一九五四年勞動報酬只一百六十多元，他當年在生活上就用了一百二十多元，經常看戲、上館，身上沒有穿過大布衣，買起香烟來，總是整條的買，丟那根吸這根，熱水瓶、膠鞋、雨傘、電筒、鋼筆應有盡有，但是，欠社裏的股金却不交清，一九五五年春天，他弟弟訂婚，又吵着要向社裏支錢。在社員中普遍討論這兩戶那個做得對。社員們一致認為南金望是從長遠打算，對社有利；張成法是“只顧眼前”，對自己不好，對社也有害。接着引導社員討論社裏財務上為什麼會發生困難，發展下去有多大危害，這個問題應該怎樣解決，提醒了部分社員，發覺自己改善生活跑到發展生產的前頭去了，認為這樣發展下去有三大壞處：一、影響了一九五五年生產計劃的完成，全體社員的收入不能增加；二、賣給國家的糧食就要減少，影響支援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三、合作社也要開倒車。通過這一討論，社員紛紛設法向社投資，制定了社的財務計劃，各戶也討論了自己的增產節約計劃。全社共交股金二千多元，加上國家扶助一部分貸款，春耕生產和基本建設的生產資金全部解決了。一九五五年執行了按各戶的勞動工分多少定期支錢，截至目前止，超支的戶（特殊原因）只是個別現象了。實行這個辦法，曾有少數社員叫喊，說社裏“兩緊”（錢緊、勞動緊）。黨支部根據這個情況，邀請附近單幹王其三來社裏座談，他說：“我兩三個月沒有錢用，你們逢時過節還可以支錢，我下大雪也在外面撿糞，成天着生產的急，比你們要緊多了。”（王其三現在已經入了社）對社員回想單幹時的困難，有很大的啓發。有的說：“我們比起單幹來，真不算緊，就是目前緊一些，也是爲了將來過幸福的日子。”

克服保守思想，推廣先進經驗

幾年來，社裏在推廣先進生產經驗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先後推廣了密植、稀下秧、改良品種、改良土壤、墾田改種、積堆肥、種二季稻等一系列的生產經驗。我們在每推廣一種先進耕作技術時，不光是向社員對比了新舊技術的好壞，還着重結合進行了增產意義的教育。就我們的經驗說，在推廣先進耕作經驗的過程中，必須進行細緻的思想教育工作。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縣委發出了推廣種植二季稻的指示，社幹部在區裏開會回來，把在區上提出的保證作了傳達；因為我們社裏沒有種植二季稻的習慣，引起社內一些有保守思想的社員的抵觸。陳揚生不相信二季稻能有什麼收成，他說：“一處黃土養一處人，牛頭怎麼能按在馬頭上？”意思是說，二季稻是別處的，我們這裏不能種。黨支部通過社委會向社員作了種植二季稻意義的宣傳教育，使大家認識到：二季稻是我們縣裏增加糧食生產的方向。鄂城縣和我們縣只隔一條江，他們縣裏一直是種二季稻，我們這裏的氣候也可以種。經過討論，一些青年積極分子說：“增產糧食對國家對社都有好處，農業生產合作社不帶頭誰帶頭。”這時，陳揚生又說：“這熱的天，人不怕，莫把牛累死了！最好還是留點生產本錢。”黨支部一面教育思想不通的社員，一面商量技術問題。在積極分子的帶動下，陳揚生等也參加了種植，共種植二季稻十五畝，一九五四年擴大到三十五畝。另外，社裏改種岱字棉時，也發生同樣的情況。一九五二年初建社時，由於受農場的影響，社裏計劃把三分之一的棉地改種岱字棉，但是有許多社員不同意。他們的理由是：岱字棉不好紡綫，岱字棉好起蟲。結果只種了一點作試驗。事實

證明，岱字棉比本地棉好。但是，直到一九五三年，還有少數人嫌除蟲麻煩，堅持少種的意見。黨支部通過社委會在社員中進行了總結教育。有了種植一年的經驗，很多人認識到改良耕作技術的好處，許多社員還自覺地檢討了自己原來的錯誤認識。他們說：“原來推廣密植，我們說：‘稀秧大棵，好粒般多’，結果是密植好。種田增產嘛，那還能怕麻煩。”結果種植面積達到了棉地的三分之二。到一九五四年，不光是全社棉地全部改種了岱字棉，並且推行了棉花整枝打杈的技術。這個技術原來大家也不習慣，後來由各隊抽出一個人，集中實習，再回去傳授。社裏爲了改進生產技術，還成立了技術研究小組，每隊選一個技術員參加，經常到農場學習新經驗。陳揚生根據幾年的體會，他認識到：“不克服保守思想，新經驗接受不了；不接受新經驗，合作社增產就有困難。”他也變積極了，被大家選爲技術組長。

我們認識到，目前增產要靠兩樁：一是接受先進經驗，二是戰勝自然災害。但在社員中恰恰有兩個思想障礙：一是保守思想，二是“靠天吃飯”。社員爲什麼還有保守思想呢？倒不是社員不想增產，却是怕沒有把握。如一九五五年春上推廣粳稻（粳稻是收一季，產量高），有的社員不同意，說“粳稻太遲，我們這裏不行。要是搞得不好，雞沒有偷到手，還要倒找一把米（白投資的意思）。”全社下了幾百斤粳稻的秧，沒有一個隊願意插它。後來，黨員周行德堅持在二隊插了三畝四分田，雖說培育得不太好，但平均每畝却收了七百零二斤，比起中稻來，平均每畝還要高出七十二斤。社裏就抓住這個事實，組織各隊派代表參觀，並且回憶人民政府推廣“岱字棉”、“勝利稻”、“南大二四一九”等良種樣樣增產的事實進行教育。社員說：“聽政府的話真沒有錯的。”一九五五年本地油菜種全部改種了“勝利”油菜種，並決定在一九五六年用百分之五十的水田種粳稻（如

有種子，就可全部改種粳稻），計劃爭取每畝平均產八百斤。我們在目前常常遇到自然災害的襲擊，在災害面前，很多社員是悲觀喪氣的。一九五四年夏季多雨，棉地裏的草長得比棉苗還高，社員們認為這下子棉花算完了，社員徐漢清說：“不靠天？哪個叫天不下雨就算哪個有本事！”黨支部積極領導社員想辦法，說明我們不能叫天不下雨，要想辦法和自然災害作鬥爭。當時，找社員到地裏去數棉株，數的結果，每畝地有一千七百多棵棉花，只要一棵棉花保住十個桃，每棵就能保住一兩棉花，每畝地仍然可以收一百斤，全社共可產籽花五千多斤，可以減少因災害帶來的損失。接着發動社員開展合理化建議，總結出老社社員饒運成雨天鋤草的經驗。這個辦法，過去因為單幹力量小，不能普遍推廣，現在合作社人多力量大，可以普遍搞，男女社員一齊出動，穿蓑衣，帶筲笠，冒着雨把棉花的草鋤了，一堆堆地堆起來，讓草瀝死，社員叫它是“埋草墳”，結果把棉花從草裏“解放”出來，以後定期除蟲打杈，每畝產了一百五十四斤籽花，而單幹戶每畝只產四十斤籽花，社裏要比他們高出三倍。

進行勞動增產的教育

辦農業生產合作社，要貫徹執行以勞為主的分配原則；但是，中農對這一個分配原則一開始是有抵觸的。一九五四年，我們社裏為了糾正過去土地報酬高於勞動報酬的偏向，根據以勞為主和降低土地報酬以後保證土地多的戶不減少收入的原則，把土地報酬降低了百分之三十，在社員中引起了很大的爭執。田多勞動力少的戶，認為百事都是土地出的，對降低土地報酬思想很抵觸。中農石松云說：“等我來燒香，菩薩就掉了背

(指他入社的時候就降低了土地報酬)，土地白送了人。”中農社員鄧良勝有二畝遠田在社外出租，每畝租穀兩石四斗，他嫌社內土地報酬低，不如在社外出租。黨支部從各方面給社員算賬，先算農業增產賬：一九五四年受了水災，社外水稻田平均每畝收四百八十斤；社裏由於改良土壤、增加肥料和搶救的結果，平均每畝收五百九十斤。尤其是棉花，發蟲很厲害，不是用藥和發動社員除蟲，根本收不了。全社一九五四年農業純收入如果除掉沒有降低的土地報酬數，農業工分(副業工分除開)平均每分值四分，一個勞動日值四角錢。同時說明：如果按原來土地報酬數不動，勞動工分分值每分只合三分錢，比社會工資幾乎要低三倍，這會降低社員的勞動積極性。用這些實例說明了：收入的增加是由勞動創造出來的。大家才認識到勞動報酬低於土地報酬不合理，會阻礙生產進一步發展。他們說：“叫我勞動一天，吃自己的得四角錢，我也划得來。”社員中的輿論是：“地不種成山，田不種成湖，一切要靠勞動。”保證了勞動報酬高於土地報酬措施的貫徹。

提高政治警惕，打擊敵人破壞

我們搞社會主義，敵人是要想盡一切辦法進行破壞的。一九五三年春天，正當大家緊張抗旱插秧的時候，社員在富農楊守貴家附近挖潤溝，楊守貴企圖降低社員抗災信心，對社員說：“插秧自有插秧雨，割穀自有割穀天，何必這忙！”有一次他竟把社內的一口漁塘挖開，把六千多尾魚秧放到自己田裏。並且還隨時隨地拉攏社員說：“人向利邊行，你看我一個月賺二十多元(經商)，你們沒命的做，一個月才能有幾個錢！”黨支部發現這個情況，一方面和他交涉賠償魚秧問題，一方面在社員

中揭露富農這種破壞陰謀。還有，一九五五年春天，正當社裏財務發生困難的時候，富農陶華雲就找到新社員張焱林說：“你一個單人，種自己的兩畝地，一年要收入幾百元，何苦要陪着他們搞合作社！”並且還囑咐張焱林說：“我兩是熟人，我才說這些話，我是爲了你的好，出去不要對旁人講！”張焱林當時被敵人蒙住了，沒有向富農這種破壞作鬥爭。後來張焱林參加了糧食“三定”工作會議，通過討論誰反對社會主義、查敵人破壞，才揭露出這件事。社裏除了及時開展對敵鬥爭以外，還組織全體社員討論了這件事，進一步提高了社員們的政治警惕性。這次我們轉高級社，富農胡立雲誣蔑造謠，說我們是“百事共了，吃大鍋飯”，被社員及時地打擊下去了，從而使社員們的政治警惕性更加提高了一步。

在整社中結合整黨、整團

我們社裏一九五四年就成立了黨支部，社裏政治思想工作是由黨支部領導的。黨支部有九個黨員，大部分黨員對黨的事業是忠誠老實的。幾年來的事實證明：哪裏有黨員，哪裏的生產就活躍，政治空氣也濃厚。但是，黨內是不是就沒有思想鬥爭了呢？不是的，社員中的思想問題，在黨內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甚至有個別黨員在某種情況下還不是站在黨的立場上來處理問題的。我們每逢關鍵性的問題，都是先在黨內充分討論，再到社委、社員中去貫徹執行。我們合作社從一九五二年辦起，當中雖說也遇到一些困難，也發生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問題，但是在黨的領導下都順利地解決了，因而在黨內產生了一種自滿情緒，認爲我們社辦得還不錯，以致一九五四年在財務工作上出了比較嚴重的問題；縣委對我們提出批評以後，我們及時召

開黨支部會，學習了“人民日報”發表的“什麼阻礙着老社的提高”這篇文章，學習的目的，是要解決自滿思想問題。在會上，支部黨員並結合社的情況展開了相互之間的批評。黨員郭金初在檢查時說：“我們新搞社的時候，人家量我們不能過一個月，如今過了三、四年，由十二戶發展到七十戶，就是垮他個三十戶，也垮不了我們的合作社，所以沒有以前那樣謹慎小心。”通過這次學習，大家都有了提高，認識到有安於現狀的思想，忘記了我們的目的是要到社會主義。正在這個時候，黨內的嚴重個人主義者——饒楚豪，他爲了個人地位，放火燒公共財產，自己又裝成打火英雄，騙取社員和領導的信任，竊取了總保管的職務；黨支部對他開展了鬥爭，並報請上級黨委批准，把他開除出黨。從此，黨支部的戰鬥力大大提高。在農業上，一九五五年比一九五四年增加一成以上，財務開支也節約了兩千多元。同時，黨支部並注意發揮團支部的助手作用。團支部組織了青年突擊隊，各隊有突擊班，他們不怕困難，在各項生產運動中，在保衛工作上，和在學習文化上都起了帶頭和突擊作用，湧現了許多模範人物，突擊大隊長楊先明同志光榮地出席了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

進行政治思想工作的方法

幾年來，我們合作社黨支部向社員進行政治思想教育，主要採取以下兩種方法：

第一，發揮黨員的積極帶頭作用。充分發揮黨員的積極帶頭作用，遇事先武裝好黨員；再依靠黨員去作政治工作，是支部作好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方法之一。一九五五年春季訂生產計劃時，有些黨員有輕農業重副業的思想，主張擴大窖業，